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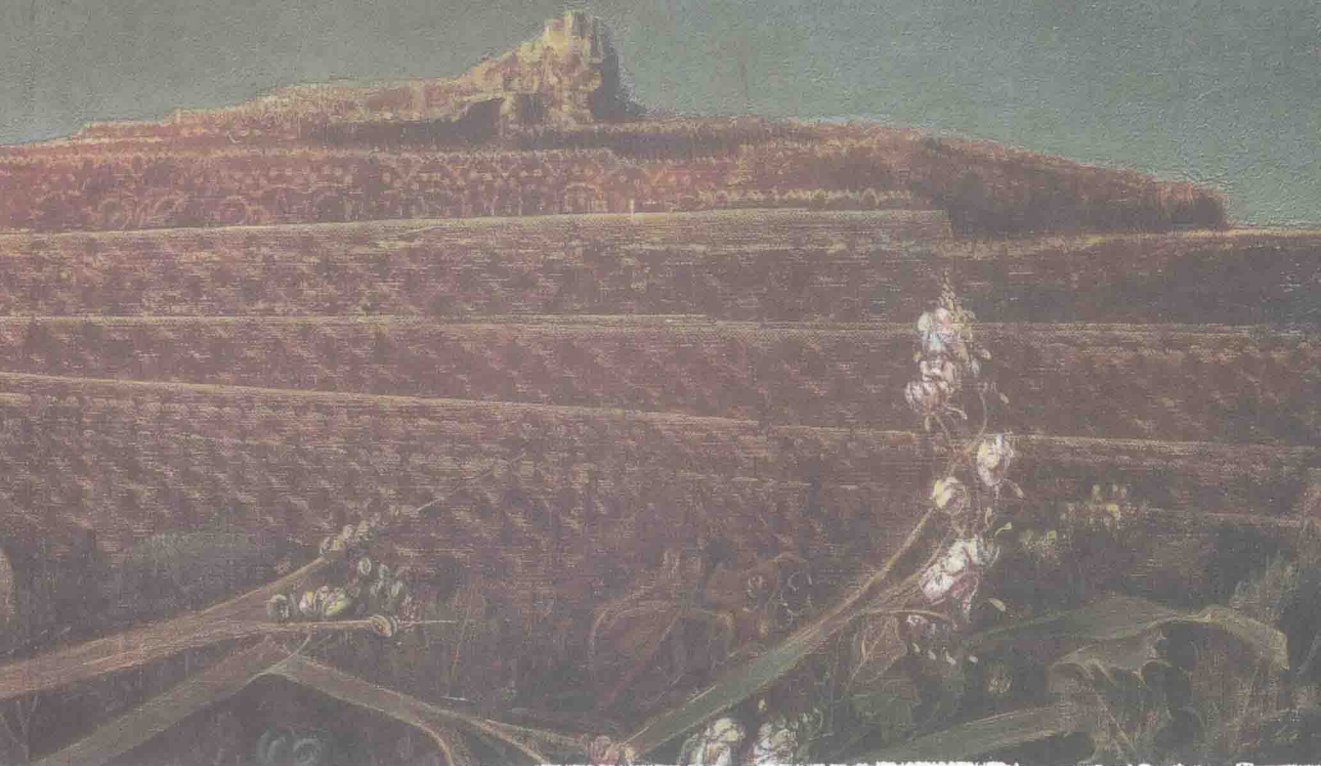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 的形义叙事学解读

NOVEL VIOLENCE: A NARRATOGRAPHY OF VICTORIAN FICTION

盖勒特·斯图尔特 ◎ 著

陈 晞 杨 春 ◎ 译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 的形义叙事学解读

NOVEL VIOLENCE: A NARRATOGRAPHY OF VICTORIAN FICTION

盖勒特·斯图尔特 © 著

陈 晞 杨 春 © 译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 / (美)斯图尔特著；陈晞，杨春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ISBN 978-7-5446-3031-3

I. ①小… II. ①斯… ②陈… ③杨…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英国—近代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9887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支顺福

---

**印 刷：**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288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446-3031-3 / I · 0230

**定 价：**4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编委会名单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顾 问：陈众议 玛乔瑞·帕洛夫 庄智象

主 编：聂珍钊

副主编：王松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仁

史惠风

吴 笛

陆建德

陈 红

陈建华

罗良功

胡亚敏

胡全生

隋 刚

曾繁仁

蒋洪新

谢 群

# 总序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思想著作，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相比，对外国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专论的译介还有待加强。这套丛书产生的初衷，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本丛书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一些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不同，在这些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永恒魅力。我们从这套丛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负责任的批评家不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去曲解文学、误导读者甚至去毁灭文学，而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这一点对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文学经典的戏说和大话倾向，其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编者期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设有所启示，进而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组织每年都要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的院士。在230余年的历史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公共管理等各领域一共选举产生了4000多位美国院士和600多位外籍院士，其中包括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00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目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含语文学学者)且仍然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他们均是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其学术思想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和文化批评界都有着重大影响。

20世纪堪称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界组织力量翻译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意义重

大。这两套丛书的选材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文学理论，几乎囊括了国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引入中国，如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还有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造就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一阵阵理论热浪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文学批评偏离了对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某些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oposition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哲学或美学命题的求证，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被解构了、被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自我演绎。文学的意义没有了，自然文学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亡。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利奥塔、拉康、赛义德等人的理论的误读或消化不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充分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9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译介给读者，试图展示当前美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热”之后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学术洞见之上的另一幅批评图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盛行于美国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在美国学界遭受冷遇。对于美国大学英语系名目繁多的理论课程，赛义德十分不满，将其称为“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200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时任主席、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也针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乱象告诫同行们说，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参见威廉·崔斯：“英文系的衰退”，《美国学者》2009年秋季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斯科尔斯也将大学英语专业的衰落归咎于理论的过度膨胀。在不少专家看来，那些花样翻新的时髦理论消弭了文学的人文价值，抽空了文学的道德情感内涵。美国国内的这一反“理论热”现象很快引起了我国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引发了对“理论热”之后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议讨论。例如，本世纪初我国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讨论，就是在理论热之后对文学理

论与批评的深度反思。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只要脱离了文学，不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根本就无法存在。只要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推崇富有情感交流的、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主张批评者要担当起文学批评的伦理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此次翻译的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译丛选取的9部专著，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可以说体现了当今美国批评家的创造性思想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其中有3部关于诗歌的专论。《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站在美国当代诗歌的最前沿，用最敏锐的眼光审视媒介时代的诗歌创作，高擎智慧的火炬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她用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引导着当代诗歌学术研究的的发展，评论家称她是一位“阅读精确、拒绝将艺术的评判权拱手交给教师或理论家”的作者。《语言派诗学》的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他是当今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诗人和理论家。他从意识形态和审美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国诗歌特征，尤其是他对语言诗的语言、声音、形式与意义以及政治策略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语言诗的一部指南。《诗与感觉的命运》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斯图尔特教授。她是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批评家和教育家，帕洛夫教授、伯恩斯坦教授分别称其为当今“国际最顶级学者”之一和“本世纪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援引上至古希腊下至后现代的诗歌经典，论述了诗歌与人类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审美的高度探究了诗歌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原来的选题计划中，我们还选择了美国圣母大学吉拉尔德·布伦斯的《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准备译介给国内学界。该书对当今美国先锋派诗歌的写作实践做了哲学层面的解读，认为诗歌的意义隐藏在诗的创作和阅读的空间之中，主张读者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回到诗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场去寻找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未能获得这本书的版权，我们无法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戏剧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著名莎学专家、前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大卫·贝文顿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贝文顿教授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他把莎士比亚一生分为七个阶段，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背景、个人生平、戏剧创作及舞台表演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驾轻就熟，思路清晰，说理透彻，成就了这部研究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3部著作。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的《上帝、格利佛与种族灭绝》从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考究，批判了近五百年来欧洲对所谓异邦“野蛮人”的“他者”文化想象，涉及的作家有斯威夫特、蒙田、王尔德、萧伯纳等，视野开阔，见解独特，启示深刻。霍普金斯大学埃里克·桑德奎斯特教授的专著《福克纳：破裂之屋》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主题、结构及其与南方神话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福克纳不能不读的著作。爱荷华大学盖勒特·斯图尔特的著作《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从文体学与叙事学的

角度，就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笔下强大的语言力量的表述与情节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方法独特，注重文本细读，是近年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文化批评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戴尔班科教授的《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一书，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部美国精神传记”。作者对美国过去和现代之间的道德传统的割裂，特别是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及精神信仰的匮乏进行了批判，作者也因此而被《时代杂志》评为2001年度“美国最佳社会评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让-米歇尔·拉巴泰教授的《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将现代主义文学纳入1913年这一特殊的年代，详细考察了1913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文学艺术现象和政治事件，如非西方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爆发前最后的世界和平、叶芝和庞德的合作等，从全球文化思想变化及交融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端，视角独特，见解深刻。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只能从中挑选部分杰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上译介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同行们在文学研究方面有其突出的优点：方法多样，务实求新，细致深入，特色鲜明。这些专著均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借得认真阅读和参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译丛选择的著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不易阅读、理解和翻译，因此对于译者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各位译者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把这些学术著作翻译得完美，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仍然无法达到目标，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主编 聂珍钊



# 谢辞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借此机会首先向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陈众议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关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关心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套丛书的选题、论证和整个翻译工作，都倾注了他的热情和关心。他的珍贵友谊、热情鼓励、宝贵建议，是我们完成此项工作的动力。还要衷心感谢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是这套译丛的顾问，为我们初选的著作提供了实事求是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评价，为我们联系每个作者和协商版权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能及时地热情地帮助我们。可以说，这套译丛得以面世，陈众议先生和玛乔瑞·帕洛夫教授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

我们还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他们是：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斯图尔特、大卫·贝文顿、克劳德·罗森、埃里克·桑德奎斯特、盖勒特·斯图尔特、安德鲁·戴尔班科、让-米歇尔·拉巴泰。我们不仅要感谢他们同意我们翻译他们的著作并在中国出版，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感谢他们随时解答译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相信，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的学者和读者都将大受裨益。我们还要感谢这套译丛的美国出版社，是它们的充分合作和授权，才使这套译丛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还要感谢庄智象教授、副编审孙静女士，以及所有著作的责任编辑。庄智象教授既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也是这套译丛的顾问。这套译丛从选题、翻译到出版，与他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套译丛也是他特别倾心的一个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一生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个项目正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孙静女士是出版社这套译丛的具体负责人，她不断对译丛的翻译工作提出具体指导和帮助，这套译丛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每部著作的责任编辑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每部译著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审校，提出十分重要的意见，消除其中的疏忽与瑕疵。我们还要感谢刘华初先生，他负责这套丛书的版权谈判。是他辛苦和有效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还要感谢负责这套译丛的装帧设计的美编，因为是他的精心设计才最终使这套译丛的出版变得完美。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参与这项工作和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离开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要完成这样一项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心存感激。

谨献给致力于阅读

并与散文与时共进的优秀的研究生

《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是盖勒特·斯图尔特(Garrett Stewart)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犀利的观点和新鲜的论述角度,为中外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种诠释文学作品的全新方法论,并且在实际批评的层面,演示了用这种新批评模式对文本进行的解读。

盖勒特·斯图尔特教授是当今美国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斯图尔特教授有着颇为丰富的学术经历:1967年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971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他的博士论文《狄更斯与想象实验》(*Dickens and the Trials of Imagination*)经修改,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狄更斯与想象实验》对狄更斯的小说进行了文体学分析,探讨了狄更斯的语言与小说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为斯图尔特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叙述,或更确切地说,视觉叙述的研究。斯图尔特曾先后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目前是爱荷华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从1993年至今,斯图尔特在爱荷华大学教授小说、电影、文本理论等课程。

斯图尔特的学术研究最突出的特色是跨学科研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小说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视觉分析、电影艺术叙述等等。斯图尔特不但著述很多,而且一些论著在美国学术界颇具影响。斯图尔特在小说研究领域成果斐然,著有:《死刑:英国小说的死亡样式》(*Death Sentences: Styles of Dying in British Fiction*) (1984)、《阅读声音:文学与声文本》(*Reading Voices: Literature and the Phonotext*) (1990),以及《亲爱的读者: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征召读者》(*Dear Reader: the Conscripted Aud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 (1996)、《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Novel Violence: A Narratology of Victorian Fiction*) (2009)。斯图尔特在电影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著有《胶片与屏幕之间:现代主义图像合成》(*Between Film and Screen: Modernism's Photo Synthesis*) (1999)以及探讨数码时代叙述文本的《框构时间:后胶片电影》(*Framed Time: Toward a Postfilmic Cinema*) (2007)。除此之外,斯图尔特还涉猎油画和雕塑以及概念艺术,著有《阅读之貌:书、画、文本》(*The Look of Reading: Book, Painting, Text*) (2006)以及《理论研究:从媒介到客体到概念到艺术》(*Bookwork: Medium to Object to Concept to Art*) (2011)。

斯图尔特的《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于2011年获帕金斯奖。这本书从文体学、语言学、修辞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角度,就维

多利亞時期小說家筆下的語言表述、暴力及情節之間的密切關係進行了細緻的解讀。作者採用細讀的手法，對維多利亞時期代表性小說文本中的句子、短語、單詞乃至音位等進行了分析，指出語言乃是構成小說的筋骨。在這本書中，斯圖爾特毫不掩飾自己對新批評、新歷史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傳統文學批評的挑戰和顛覆，自創了一套糅合語言學、修辭學、文体學和敘事學等文本解讀技巧於一體的方法論。斯圖爾特自己把這種方法論稱為“一種分析程序，而不是文本的組成要素”；就分析程序而言，“形義敘事學是一種針對於局部的閱讀活動，而不是社會的或者認知的科學”。斯圖爾特強調用這種方法論進行文本分析時，要注重新分析小說中語言的形、義，而不是文類樣式；“聚焦句法，而不是語言文化，少問是什麼構成敘事，而多問它在句法的时间框架中如何展開”。斯圖爾特認為小說的情節表現在詞匯句法變化和語言錯亂中，或者表現在修辭及其更深層次的語言“暴力”中。《小說暴力——維多利亞小說的形義敘事學解讀》全書分五章，在各章中，斯圖爾特運用這種批評模式分別對維多利亞時期的重要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安妮·勃朗特、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及愛倫·坡的作品進行了詳實的考證和分析，目的是讓讀者關注敘述語言本身的微觀境界，通過詞法、句法、語法和音形來重新捕捉其深層蘊意，分析情節的演進，追蹤整個小說的建構過程。

《小說暴力——維多利亞小說的形義敘事學解讀》是國家出版基金翻譯項目“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文學批評經典”中的一本。筆者有幸成為該翻譯項目的成員之一，負責這本書的翻譯。如前所述，這本書所論述之批評方法——“形義敘事學”——為作者自創的文學批評理論，除此之外，斯圖爾特還自創了一系列的術語，並運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段，尤其是雙關、隱喻等等，翻譯難度頗高，對翻譯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首先，書名的翻譯就頗為棘手。Narratology 這個詞實屬作者杜撰，筆者斟酌數月，期間，除了向認知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敘事學、翻譯等學科領域的國內專家請教以外，還諮詢了精通拉丁語的法國學者、英美留學生、美國漢學學者等等人士，均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Narrato 作為拉丁詞根比較容易理解，表達的是與講述、敘述有關的意思，但是 graphy 却有“寫、圖”兩種意義。筆者多次和作者溝通，斯圖爾特表明“more like cartography, or let's say geography as science rather than landscape.”因此，筆者認為作者的思路和意圖是通過圖解式地解析文本中的詞法、句法和修辭等形式來闡釋小說中的情節，揭示深藏其中的意義，因此，筆者依據翻譯中的歸化策略把 Narratology 翻譯為“形義敘事學”。另外，標題中的“novel”和“violence”均為作者的文字遊戲。“novel”是作者的一語雙關詞，斯圖爾特在給筆者的信中解釋，“novel”一方面是指“小說”這種文体，另一方面“‘novel’ in English, as an adjective for ‘new’”，“novel violence”可以理解為“虛構暴力”或“暴力虛構”。而 violence 在書中的涵義更為複雜：其一，指小說情節中的暴力(violence)，其二，是小說詞法、句法的背離常規(violence)，其三，指最終產生的小說的強烈震撼力(violence)。由於中英文語言表達的差異，我們無法找出與此完全對應的中文單詞來表達，斯圖爾特對這種語言的非對等性非常理解，在給筆者的信中建議對“violence”的三層意思中只取其一來翻譯：“You have the sense down of the threefold meaning, but I gather from my consultant here that that too would be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Maybe

just “Violence of the Novel” in the primary sens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s the way to go, with the other senses coming out in the inferences of ‘narratography’.” 笔者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确定了现有标题的翻译。

虽然翻译难度巨大，但是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收获良多，特别是自身异质文化理解力和逻辑思辨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斯图尔特教授在《小说暴力》中自创了很多术语，比如：co-optimely, trancescript, dysclosure, poe/tics, poescript 等等上百个新词，其文独出机杼，奇辞奥旨，措词惯用冷僻深奥词，句法层层叠叠，错综复杂，此外，文中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段，尤其是双关、逆喻、矛盾修辞法等等，纤余委备，给翻译处理带来很大的难度，要原汁原味地再现他的写作风格几乎不太可能。本书翻译者殚精竭虑，命词遣意，力求用符合中文文法的语句较为准确地翻译原著，把这种全新的小说方法论译介给中国读者，给他们提供借鉴。

本书翻译工作由我主持，全书由我和杨春共同翻译，具体分工为——杨春：序言、绪论、第二章、第四章、后记；陈晞：第一、三、五章。最后由我负责全书的统稿。本书的顺利完成，得到了诸多学者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我们要对盖勒特·斯图尔特以及汉学专家朋友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在翻译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松林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尚必武博士对本书部分内容的审订。特别要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支顺福先生，感谢他对译文的校改和编辑所做出的贡献。另外，感谢我的研究生翻译小组成员余芬、谭淑林、赵顺、弓小红、彭明星、张玥、何康、周康，他们为翻译前期准备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着诸多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学者、读者批评指正。

陈晞

2012年11月12日

于湖南长沙江岸景苑

# 目录

译者序 .....	1
序言 散文体的小说 .....	1
绪论 叙事内张力 .....	9
第一章 被省略人物的情节	
《小杜丽》的缺陷 .....	21
第二章 被过度关注的紊乱	
爱伦·坡式“过渡状态”与情节 .....	41
第三章 心境的框架	
安妮·勃朗特的交换经济 .....	61
第四章 逝者如斯	
欲望的磨坊 .....	87
第五章 死亡的必然	
《苔丝》的注定结局 .....	119
后记/对话 作为媒介研究的小说批评 .....	151
原文注释 .....	163

# 序言

## 散文体的小说

本书全然是历史主义研究。它也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几部成就斐然的文学学术论著之一，书的开头也是这么宣称的。我虽然没有去核实，但毫无疑问，它们表达的就是这种看法。其他的文学学术书籍也是如此，只不过和本书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本书采用的历史主义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的确存在于近来小说批评的文化思潮中——是指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一样去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当然不是在每个环节都去考察小说的话语语境或社会语境，而是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那样真真切切地去阅读文本：即将小说的语境视为自己所处的语境，鉴赏小说主要不是为了迎合公众的猜想，确切地说，是为了发现小说语言和情节的新颖性——以及构成曲折情节的语言，包括语言的震撼效果。

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是一个短语一个短语地，有时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品读这些具有魔力的作品的语言的。通过更大范围的联想模式，他们尽情地欣赏句式的节奏、措词的惊异、缭绕的音韵以及句子的抑扬顿挫，同时也享受作品强烈的情感震撼和冲击。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尽可能让作品本身对自己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他们不会无休止地依据印刷品之外的传闻和记录技巧去解读作品的言外之音——这儿只是列举出近年来“开发”文本以获得它们那个年代的技巧和见解的方法中的两种——以探索作品与盛行的意识形态有关的深层含义。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让作品本身来展示其含义。他们在被小说深深吸引之时，作品中每个字眼的语音就会在他们耳中回响，这样的读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内化了。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因为有种途径可以使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只要想想我们自己通过阅读获得快乐与全神贯注的程度（而且有时和他们一样投入），便能类推出来。至少在电影出现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小说是维多利亚时期公众主要的流行传媒工具。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为小说独辟空闲时间，他们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感受小说的词藻和情节。即使是在不出声地静静阅读时，他们的耳际也难免有作品诵读的余音缭绕，使得每处图书馆、公园长椅以及火车车厢都变成了改换地点的炉边雅座。作品总是一页页地被他们自然吟诵，即使是在索然独处时，这种传动的力量也完全被自己独自的无声韵律所激活。小说阅读从头到尾完全被文化理念分成不同层次——但是，首先，铭文般的浓重效果产生了有声语言。在那些文化蕴涵最丰富的小说中，无论是有关重要的议题还是神秘的议题，平铺直叙胜过劝诱，措辞胜过质询，动情胜过思想意识的反思，文辞的取悦胜过强词夺理。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不得不通过阅读领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似乎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在体裁作为文化形式的演变过程中，小说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众书面传媒的支配力量起到了社会同化的主要媒介作用，即使是在它的影响力受到质疑时，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小说以多种方式影响公众，当然，首先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影响着他们。

然而，就绝大部分近期发表的评论文章而言，“散文”这个修饰语对于“小说”这一类别指称几乎已经成为无实质意义的定语。这是因为小说似乎主要如实地反映了过去生活或经验的一个侧面，它从历史的角度参与生活而不是想象虚构——而且有时非常冷静客观。“就历史的语境而言，……必要的阅读已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历史语境的阅读方法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阅读方式。”近期某杂志特约专栏中这段含沙射影的摘录，难道想为某些非常规的阅读方法铺平道路？鉴于目前阅读动向的惯性作用，这一点好像不太可能。其实这是在上世纪中叶，就是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他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新新批评理论”中的主张。<sup>[1]</sup>无论是文化研究经久不衰的盛行趋势还是刚刚涌现出来的从物质角度探寻文本客体在商业交流中的传播途径，其本身是强烈挑战“新新历史主义”层次化的超文本描述。这不必顾忌提及在作为客体的小说中得到明确表现的东西，是上述两种相近方法在探讨维多利亚小说话语场(更不用提文化形式)时所未触及的。

还有另一些长期存在的趋势和默认值得提及，即便不一定须对其作驳辩性的阐释。按照布鲁克斯曾表述的，对小说作更理论化的探索确实难以确切地说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对小说形式的叙述学的阅读是不可或缺的，或认为此类阅读方式运行得当，甚至我们中一些人受这个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把它看作唯一可行的阅读方式。但情况往往是，普遍概念中的叙述理论在多样性和微妙性方面已经退化为等同于叙述理论超文本的僵硬和它惯常的图解化层面。极有可能，对任何媒介的叙述结构的唯一可行的理论性阅读，必须一开始就要同样避免以抽离了叙述理论为特征的表面织体，不管这种叙述的介质是文稿的或视觉的，小说的或电影的。

与此同时，严肃的体裁批评越来越注重历史，而且近来主要局限于对漫长的18世纪小说崛起的研究。小说先驱者们开拓了它的形式。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在评论方面似乎普遍了无声息，他们尽其可能快地出书，使工业化和帝国时代的新词语以既成的样式不断流通。注重语篇分析而不是体裁研究使这种方法形成一种缺失，尤其是在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研究上的缺失，而当代小说理论某些最具洞察力的研究成果本可能就此给人以启示。不过，在以后的章节里可以看到三种理论的交会：在对小说逐句的分析中体裁理论打破叙述学的局限性脱颖而出。这里有必要先来观察一下从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到迈克尔·麦基恩(Michael McKeon)的体裁理论中那些关于反讽逆转的诸多论调，将之对比那些语言形式的反讽析取，后者正是新批评以及解构主义的核心所在。<sup>[2]</sup>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贯穿在写作手段中围绕独特的叙述反讽的措辞曲折的体裁，勾勒出写作和情节构思的交叉。散文体的小说是一回事：它是体裁的标签。用散文写出的小说又是另一回事：它要唤起生成性阅读，按照(文体)形式所产生的叙述意义，并受到发展性的制约，去追踪有联系的思路。

当读者打开这本书，却不知道它主要希望读者知道些什么时，鉴于本书力求将多个内容



融为一体，应该再给读者多一些导向性词句。你从书架上取下此卷，如果将它按概念分类，就会把它径直放到藏书室的另一个书架上，那儿有它理所当然的位置。我想，对于任何作家而言，事先浏览寻找阅读线索，能得到入门的途径。至少我就是这样卷起袖子翻阅浩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叙述故事，在我对小说进行多年的著书立说，期间又间断十来年之后，终于眉目清晰起来。难道我以前关于小说及其散文体裁的评论，累计至今，会有某些新的感悟需要增补？更有甚者，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或者明显的办法是，当某些事情与以前的部分脱节甚大时，要进行一次回顾反思。此时此刻，当其中的可视文化出版物摆放到书架的另一边时，至少有一件事似乎是可行的。任何关于小说和语言的持续性写作的研究需要间歇性停止，应该提供一个有益的时间距离，与搁在另一边的以前的四部文学批评著作隔开一定距离。自然，可靠的办法是至少快速回顾一遍。结果是把重温旧事和序言糅合在一起了。

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后期，我的文学批评专注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通过修辞技巧和叙事例证，我的研究已经从狄更斯的代表作的人物语言活力，跨越到英国小说对死亡场景的修辞挑战，到散文和诗歌的心领神会，直到怎样唤起小说的读者。<sup>[3]</sup>正如所料，一眼看上去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成分杂乱。这不足以让人灰心，也不足以另谋新图。<sup>[4]</sup>回顾维多利亚时期的冲突，如果不是遮盖秘密，而是按当前癖好，既急于研究19世纪小说批评的状况又研究叙述理论的最新发展，借助新小说的例证，它让我初步明白，清晰回顾更早的写作方法本身，可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可以说，为了聚精会神写好我的新著，我最好是从对已有素材加以重组开始。或许以前的各本论著比有意的筹划还更相互贯通。

在我最初的研究里，结尾部分用了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一个角色呼唤她的密友“过来，去死吧”，这种扭曲的逆喻手法本身确实激发出了一种一语双关——这在许多小说中得到了印证，从狄更斯到康拉德，到伍尔夫，不胜枚举——这种叙述方式的虚空性演绎出对真实死亡时刻和形象比喻危机的语义双关。于是，在“死亡句子”或者表现其他情况的句子，文本的激活作用要求叙述性散文具备不出声的内涵负荷——维多利亚时期若干主要小说家所造就、并为其现代派后继者进一步强化的后浪漫主义浓重的有声化语言中尤其如此。这些至少潜在的萦绕耳际的声音如何能对潜移默化读者的投入不起到一种关键的作用呢？何况人格化的面谈语气（对读者大众的“亲近化”）也是频用手法，在维多利亚时期，狄更斯最擅长此道。

由于我自己在所选择领域有十分可靠的导向，而这事后证明是正确的，于是，面对一种侧重语言研究的方法是及时放弃还是重新采用呢？我选择了二者并用。这种努力体现了更广泛的关注点，前所未有的地关注于维多利亚时期叙事作品的小说暴力（两层意义上的）<sup>1</sup>，用这种新方法解决以前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立即会出现新的格局。当它呼唤采取行动时，甚至“亲爱的读者”之转义也能利用情节重新塑造，这种情节极像设身处地的渴望，或者进取性的共同选择——对在叙述魅力的基础上反复出现的情节剧暴力提供社会化对比。即便如此，如何解

<sup>1</sup> 原文中是 *novel violence*，作者指出的双层意义上的 *novel violence* 是指：一方面是小说情节中的暴力，另一方面是小说在艺术上的违背常规即破例。